

标签固化，“双非”院校逆袭有多难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传统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以及如今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之外，占我国高校大多数的是“双非”院校。这些院校的毕业生，无论是考研、找工作，“双非”的身份标签都如影随形。考研竞争加大、学业上升通道未理顺、社会分层固化……他们的经历是“双非”院校处境的缩影。而对于办学经费与“双一流”高校有指数级差距的“双非”院校而言，逆袭之路更为坎坷多艰。

离2020年考研时间结束刚过20多天，成绩尚未公布，安徽某地方院校本科生王晓就投入到新一轮考研备战当中。

“像我们这样的大学，整个学院一年能考上10个人就非常了不起了。”王晓的辅导员李涵说。而毕业于原“211工程”高校的李涵清楚地记得，当年全班32人，考上研究生的就有10余人，这还不算保研的同学。

王晓所在的高校既不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也不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双非”院校。每年都有部分学生加入考研大军，但又齐刷刷落榜。“有人研究生毕业了，而他曾经的室友还在4战考研。”

“究竟是考研变难了，还是自身水平下降了？”夜深人静之时，王晓总是忍不住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追光”之路越来越窄

留给“双非”院校学子考研逆袭的赛道，越来越狭窄了。

教育部在2013年发布通知要求，高校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50%。但在那之后若干年，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时有超过这一比例。名校接收的推免生中“双一流”高校生源占比居高不下，接收的非“双一流”推免生数量有限。

与此同时，我国考研报名人数逐年暴增，2016年177万人，2017年200万人，2020年341万人，2021年377万人，近5年增长了200万人。

“如果按平均数来算，5到7年前，你和对手的竞争是1对1，而现在是在1对4。”李涵说。在这场依旧是“拼成绩”的大考中，一些“双非”院校看到了“生机”，将平时课程调整为考研科目，全力支持学生冲刺名校。但事与愿违，曲阜师范大学等考研基地的出现，反而加重了考研环节“双一流”高校对“双非”学子的排斥。

他们的命运被捏在“双一流”高校复试官手中。王晓的师姐曾初试高分考入北大，却在复试中落败。“‘双非’学子留给复试官的刻板印象是，死读书，科研能力不足。这就跟大众消费心理一样，在对商品不了解时，你肯定会选择更有保障的品牌。”李涵说。

事实上，“双非”院校以培养为地方服务的人才为主，在学业上更理想的上升路径是专业硕士。尤其是2020年，我国加大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扩招力度，给“双非”院校学子带来一线曙光。但这条路，同样不顺畅。

专业硕士被认为“低人一等”，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培养同质化……重重复复，让王晓等考生在报考的门前徘徊。一些高校的专业硕士，更是在复试阶段成为了学术硕士调剂的“后备军”。换句话说，无论是考专硕，还是考学硕，进入复试时，你面对的都是同一批复试官，或许还是同样的标准，落败的几率并不小。

当然，考研并不是“双非”学子逆袭的全部。有人有一技之长，毕业后创业白手起家；有人一早申请了国外高校，毕业后以“海归”身份淡化了“双非”标签，但他们毕竟都是极少数。

而作为主流的逆袭通道，考研尤其是考名校的这扇门正悄悄地向他们合拢。“多轮备

考、二战考研，靠考研的诚意打动考官，实在是无奈之举。”王晓说。

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

也有人质疑这一群体参差不齐的水平。毕竟在王晓的身边，有不少“温水煮青蛙”者。“他们也上课，不迟到，不逃课，考试也能通过，但从来拿不到奖学金，也不参加任何比赛。”

李涵曾问这部分学生，他们一天的学习时间有多少？学生想都不想告诉他，“上课不就是学习，上完课就去玩。”游戏肯定是打的，但碍于辅导员询问，只敢勉强地说：“一天不超过两个小时。”而且，还带动了身边的男生、女生一同加入。

这部分“无欲无求”的群体，成为“双非”院校“沉默的大多数”。

而对于想努力发愤的学生来说，信心不足又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大问题。

竞赛获奖是考研复试的筹码。然而，在2015—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竞赛排行榜中，前10名被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包揽，前100名中有66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些获奖项目很多是由教师项目转化的学生项目，‘双非’院校科研跟不上，很难从中脱颖而出。”李涵说。

“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考研时想都不敢想。视野不够开阔，是‘双非’学子的通病。”毕业于某“双非”院校的张艺，读书期间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毛概老师，“是他一步步指引，最后张艺才下决心考取了北大。”

但对于更广大的“双非”学子来说，“普遍缺少一位引路人”。张艺毕业后，进入福建某高校当老师，曾向学校建议设导师制，但直到他离开这所高校，相关制度依然没有建立起来。

即便有，在赵曼所在的某中部“双非”院校，也不过是摆设。

她所在的高校去年上半年开始实施导师制，但直到年底教研室主任才匆匆忙忙地把导师与学生按学号随意分了一下，学生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政策存在。之所以年底匆忙分配，是因为要计算工作量了。

而所谓的工作量，制度上不可或缺，但又“鸡肋”十足。指导一名学生一年，算作1.5个工作量。“上一门课起码有300多个工作量，辛苦指导学生才给1.5个工作量，在一些老师眼中导师制约等于白费心血。”赵曼说。

这些年当地的房价翻了一番，但教师的工资只涨了一点儿。慢慢的，一些“脑子活跃”的教师纷纷在外面开设培训班、公司，甚至把学生介绍过去兼职。有的教师给学生的工资很低，导致一些负面言论在校园内流传。上课事实上成了这些教师的副业，没时间备课就直接把培训班的讲义搬上讲台。

“单纯的师生关系，变成了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变得非常功利。”赵曼说，为了应对评教，一些教师在课堂上“哄”着学生，找点有趣的故事来逗逗他们，却没教多少实质性的内容。

而学生也“会意”得很快，“看准了学校鼓励学生向应用型方向发展，各种请假条像雪片一样塞来”。有人上课上到一半，突然请假去实习，也有人曾拿着学车的假条要求请假。教师无从辨别事由的真伪，只能作假，但那份

授课的热情却被逐渐浇灭。

“没有高质量的师资，又何必高质量的学生？”曾经在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科技学院担任校长、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叶高翔表达了这一观点，但又很无奈地表示：“‘双非’院校很难吸引高水平人才，即便有幸引进个把人才，又很快地流向更高的平台。”

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而这仅仅是“双非”院校自身的问题吗？

缺少逆袭的“资本”

就像柔道场上的“以小博大”，看到小个子战胜大个子，观众总是忍不住叫好。未来，是否还存在一丝可能，让这样的精彩在“双非”院校上演？

不久前，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在公开演讲中说道：“没人告诉家长，教育是用来社会分层的。”这一揭露中国教育的迷茫与困惑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最大的教育分层，早在高考时已经决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此并不乐观。

从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在进行分层。“从刚开始的‘有陈可乘’，到如今越来越‘固若金汤’。学生由‘双非’院校考进‘双一流’高校，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结构分层，实际上是以官本位的行政体系作为支撑，涉及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一所高校在行政架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就决定其获得什么样的资源。“大结构不动，相应的教育分层也不会发生变化。”储朝晖说。

教育部2019年统计数据发现，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2688所。其中，“双一流”大学仅有137所，包括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双非”院校共2551所，占比高达95%。

然而，储朝晖指出，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分配却是典型的二八制，20%的人享受80%经费，80%的人分配剩余的20%经费。“双一流”建设，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与“双非”高校经费之间拉大到指数级。

留给地方院校的只有个别建设工程。如被称为“小211工程”计划的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一期和二期总共涉及137所高校。其中，还包括13所原“211工程”高校，3所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高校。

人才引进要高薪和平台、落实导师制需要增加编制、教师收入有待提高、鼓励学生参

加学科竞赛需要投入……缺少“资本”底气的“双非”院校，想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谈何容易？

自主权用好了吗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更多人有意愿的可能，筹措经费对“双非”院校而言是更紧要的事情。

“‘双非’院校自身筹措来的经费比重，少得可怜，几乎没有。”洪成文建议，这类院校应扩大资源渠道，让其更加多样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在他看来，首先在于高校向社会筹资的主动性不足。新建本科院校忙着迎接合格性评估、审核性评估等各种评估，在时间、精力上难以继续，无法进行资源渠道的扩展。

其次，地方政府对高校自筹资金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甚至反过来加以限制。“筹到钱后要解决两个审计上的问题——怎么花，花得好不好。很多高校领导都有一个错觉，不找钱就不惹麻烦，找了钱还可能受连累。受连累的思想，会给校领导的积极性带来很大打击。”

“要给地方院校更多的自主权，地方院校也要用好自主权。”储朝晖说，现在很多地方院校被管“死”了。比如，地方院校没有独立的外事交往权，相关活动必须接受当地外办的监管。“未来是否可以灵活一点？地方院校达到某一水平，就拥有独立的外事交往权，可不经当地外办的审批，让它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当然，也有地方院校自身的问题。储朝晖发现一个现象，越是中西部地区，对于英语四六级考试弃考的惩罚就越严重。“机械死板的管理，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变为高中阶段的简单重复。越是底层的‘双非’院校，类似的官场作风越是明显。”

采访中，受访者纷纷表示，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亟须改变。

叶高翔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应用型人才紧缺是制约我国“卡脖子”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211工程”推出之后，就有人建议设立应用类的“211工程”计划，大力培养我国的应用型人才。而“211工程”完成使命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双一流”建设。“未来是否可以匹配国家级的应用型‘双一流’建设计划？在评价此类高校和人才时不‘唯论文’‘唯帽子’，而是重在解决国家和生产一线的重大需求。”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曾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地方大学建设不只是地方政府的事，要进一步打破中国大学的身份限制，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将地方高校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地方大学建设进行刚性约束，推动地方大学由大变强。

需要教育家办学

筹款之外，“双非”院校人才培养的“恶性循环”，能否通过内部治理加以规整？

赵曼所在的“双非”院校并不缺少改革，甚至是“三天两头改革”，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都无法很好地落实。

“需要有一位有志向的校领导去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工作或符合他意志的改进，这比所谓的整体性改革更有效，即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办学。”储朝晖说。

在现实中，一些有志于改革的校领导行为，或许让人不能理解。他举例说，比如，校领导从一所“双一流”大学调任“双非”院校担任校长，但是他选择工资仍在原来的大学领取。表面上看似似乎是对现在的大学没感情，但他所做的是对现在的大学起到关键性作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避免了他与现在大学内部的领导班子产生经济利益上的瓜葛，减少了改革的障碍。”

储朝晖认为，加强与办学水平高的大学交流，选拔一批真正有专业、有抱负的人到“双非”院校担任要职，这种方式对于提升“双非”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更有帮助。

“在新的时代，‘双非’院校发展一定要坚持创新发展、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人才培养质量应注重其未来的创造力。所谓创造力并不是仅仅看学生的考分，更应该体现在学生未来能否为企业、为国家、为人类带来创新、突破和贡献。”叶高翔强调，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分不同类型的，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

对此，储朝晖提醒道，“‘双非’院校要找到自身优势，逐渐提升。”这是一条重要路径，如果这一路径没有走通，只是简单地强化应用型标签，反而会陷入低层次建设的循环当中。实际上，对于“双非”院校而言，只要做得好就有应用前景，反之做不好就容易被淘汰。”

在洪成文眼中，“双非”院校已经有了一些逆袭的标杆。比如，合肥学院作为“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与德国萨克森州30多年来保持密切联系，吸收德国先进的办学经验，成功地实现了本土化办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未来在人才培养上，通过生涯发展规划来提高‘双非’学子的信心，这是第一步。”洪成文说，“第二步是将个性化的生涯规划落实到‘双非’院校的教育方式中。新建本科院校容易攀比高水平大学，攀比的结果是自己找不着北。怎么在制度上落实个性化培养？有部分院校已开始实行双轨制或多轨制，把学生分成三个不同方向、层次加以培养。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办法。”（部分受访者化名）

中国大学评论



樊秀斐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本质上就是要力戒学术评价中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关注学术成果实际水平和贡献的“同行评议”必将是今后教育科研评价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同行评议制度是专业领域学术评价的国际惯例，但其自欧美引入中国后，出现了“权力支配、人情主导、标准缺失”等诸多问题。不少人认为在国内现有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生态下，同行评议很可能被各种权威意志和“帮派”势力所“绑架”。如果同行评议在国内就会由“橘”变为“枳”，那么国家教育科研评价改革将陷入困境。

当前学界人士和社会大众对同行评议存在的各种质疑反映了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同行评议制度本身，恰恰是同行评议制度没能很好地实施到位，同行评议的优势没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同行评议的精髓是让“学术权力”在学术评价中得到充分尊重和行使，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内一些评审专家在同行评议活动中不是站在独立、客观和专业的立场，而是听命于“长官”指示，反而使得同行评议变成了“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的合理合法途径，并由此产生出了种种“龃龉”行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破解，将会严重影响同行评议的科学性和公信力。要让同行评议在国内依然是营养丰富且深受喜爱的“橘”，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保证同行评议中的“同行”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同行。同行评议的逻辑意义就在于学术问题唯同行才能由表及里、客观公正地评价。真正的学者只求真理，只要发现问题，他们一般都会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较少会毫无顾忌地干出违背学术道德和有损自己学术声誉的不上台面之事。而现在的一些所谓同行专家，他们本身就是靠关系起家的“伪官”专家或者是长期忙于应酬、疏于学术的“冒牌”专家。他们学术评判能力低下，在同行评议中更容易有意或无意地被各种非学术性因素带偏。同时，现代科学发展既细分又交叉，越是高精尖的学术评价，对同行专家的研究方向要求越高，所以开展同行评议活动，组织同行评审专家的负责人首先必须是同行专家，这样才能保证其邀请的评审专家是真正的同行专家。

第二，同行评议中的专家评审是一项需要高投入的专业工作。同行评议的科学性，最终体现在同行评审专家的工作结果上。众所周知，学术评价处于知识生产的最高层次。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同行评议中的专家评审工作需要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又需要大量脑力和体力的投入。国外有的专业人士当评委不拿物质报酬，他们把学术评价视为使命和荣耀。虽然国情不同，但国内却存在评审专家参加学术评议工作事先不阅读到手的评审材料，也不做任何相关的学术准备，到现场随便拍脑袋“胡言乱语”的现象；还有评议过程中专家闲扯、接听电话，甚至中途开溜办私事，把理正儿八经投入的工作投入了偷玩还有高收益的奖励或福利活动。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把专家评审工作视作对个体学术资历、名望或人脉等“馈赠”的想法和做法，是对评审工作的严重亵渎。

第三，具有可操作性的申诉机制是同行评议的有机组成部分。同行评议如果没有配套的公开、透明、经得起公众质疑的申诉机制，不能称之为同行评议。同行评议的公平、公正性来自于学术共同体对各自权利和义务的主张，以及学术规范的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其中被评审方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已具备让各种非学术的人为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降到极低的可能。这就是说，通过申诉机制来倒逼同行评议的组织者和评审专家不敢玩忽职守完全行得通。相信只要申诉机制完善并执行到位，那种早已内定好人选或者找几个评审专家来糊弄一下的假同行评议就会难以“生存”，而那些态度、能力或者其他因素不合格的评审专家也更有可能会“露馅”。

第四，同行评议是需要多元主体和多项制度保障的系统工程。同行评议绝不是涉及几个专家的事，而是由组织者、评审专家、被评审者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构成的系统，主要职责可分为组织者拥有管理职责，评审专家拥有评议职责，被评审者和公众拥有监督职责。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制度体系、执行机制来加以明确和规范。具体来说，相关的制度主要包括承诺制度、回避制度、遴选制度、培训制度、追责制度、奖惩制度等；相关的机制主要包括专家遴选机制、专家培训机制、利益冲突回避机制、反欺诈和反贿赂机制、同行评审专家的诚信调查（监督）机制、项目申请人的申请和申诉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等。相信随着各方主体职责的落实和各项制度的完备，国内同行评议的科学、客观和公平、公正性会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最后，有必要再次重申，学术评价从重视指标数量到强调成果质量，同行评议是学术评价“绕不过去的坎”。大家担心国人骨子里“拉关系，讲人情”的文化基因会让同行评议“变味”，“五唯”中就有很大的同行评议成分。今天我们把同行评议可能出现的问题放到台面上来直面和解决，虽然工作量和难度会大大增加，但只要上下齐抓共管、同心协力，相信同行评议在中国不仅不会由“橘”变“枳”，而且会更加香甜。

在中国，同行评议一定会由『橘』变『枳』？